

『国医』之殇

百年中医沉浮录



近代以降，西风东渐，中国文明历经裂变与再造，冲突和自守，号为“国医”以自尊、自强，却面临生死存亡艰难变局。中医之路，在于“返古”还是“推新”？
通过百年层层烟云，直抵当下困局种种。

郑洪 陆金国 著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官方媒体

南方都市报

重磅专栏

国家中医药行业唯一权威大报

中国中医药报
China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国医”之殇：百年中医沉浮录

序篇

近代,是中国文明裂变与再造的时期。西风东渐之下,传统医学与传统文化的其他领域一样,不可避免地步入了著名中西汇通医家唐宗海所称的“古今大变局”中。在这个“变局”里,人们要面对的不仅是医学知识与思维的差异,更有社会整体环境改变下的适应与生存问题。近代,是中国文明裂变与再造的时期。

虽然依通常的划分,“近代”只是从1840年起到1949年止的短短110年,在源远的历史长河中并不起眼,但其间,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化的改变之剧,远远超过此前的三四千年。在此,我们且不去细数这110年间的激荡政治风云,但我们必须认真审视文明的蜕变,因为它实实在在地影响了中华文化发展的轨迹。

中西医学文明的汇聚

近代中国文明之变,有的属大破大立、发聋振聩之举,像废科举兴学堂、白话文运动、科学与玄学论战等等,轰动一时,堪称近代思想启蒙的标志性事件。有的则无声无息、潜移默化,像火车、轮船、报纸、照相、电影等新事物,开始不过是在“奇技淫巧”的批评声中零星出现,但一两代人之后就已成为时尚,甚至成为习惯。物质与技术对文明的影响力,比思想冲击更为持久,甚至更不可逆。

人类生活中,病痛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各个古老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医学,造福人类。中国的中医学在这方面尤为突出。因为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的文明没有发生过大的断裂,中国人的生活环境没有发生大的改变,这对于中医学的发展极其有利——理论框架长期稳定,医学思想和医疗技术经受反复验证,有效医药经验可以不间断地累积增多。

广东僻处岭南,与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中原地区相距较远,在古代更因交通不便,文化开发较晚。中医药虽然在汉晋时期已有传入,但要

到宋元之际才开始普及和发展。然而岭南炎热多病的环境, 恰适合中医药大展身手, 因而很快在民众中有了良好的基础。明清时期广东作为对外交流的重要口岸, 商品流通, 经济繁荣, 医药商贸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这也促进了医药知识的普及。清中晚期的广东已经成为传统医药业的重镇。

但是习惯了传统医学的中国人, 与其他领域一样, 在清末民国也开始面对一种完全不一样的医疗文化——近代西医学。处于对外开放前沿的广东首当其冲。

言“西医”, 之所以要加以“近代”二字, 那是因为西方医学有古代、近代(20 世纪中期以来已发展成现代医学)之分。古代的西方医学, 指以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为代表的传统西医, 它在形态上与古代中医、古代印度医学等只有内容上的不同而性质类似, 都是以哲理性的医学理论为基础, 统系着丰富的医疗技术与经验。而“近代西医”, 指的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 在近代科学兴起的背景下形成的新式医学体系, 它以观察和实验的科学方法为手段, 分化出系统细致的基础与临床学科, 以社会化的公共卫生观念介入国家行政等。这些对近代中国人来说, 无疑是一种新的医学体验。

贸易与宗教, 是文化传播的两大推手。但前者逐利来去, 缺乏恒久。例如在 1840 年之前, 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外国来华贸易者中不乏西洋医生, 但主要限于为外国人服务, 缺乏在中国立足的意愿。唯一有影响的是将西方预防天花的牛痘法传入中国的东印度公司外科医生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 1780-1874), 他也主要是通过培训中国助手邱熹等来开展工作的。实质上, 贸易并没有促进西方医学在中国广泛传播。

而宗教, 则具有利他性和大众性, 对文化的传播更为持久和坚韧。西方的基督教传教士们, 在清代中后期怀着“拯救”中国人的想法, 前来传播“真理与文明”。但是在接触中他们发现, 基督教义与中国的信仰传统差别极大, 要想深入接触中国人, 最有效的方法是利用各

种世俗的科学与技术。西方正在蓬勃发展的近代医学,令一向有关怀病苦传统的教士们多了一个有力的手段。近代西医学正式传入中国,早期正是附宗教之骥尾而来。

图 1 彼得·伯驾像“以医传教”下的西医渗透

通过医学来促进基督教传播,是谓之“以医传教”,广东正是这一思想的发源地。

1834 年,一位拥有医学博士头衔的美国传教士彼得·伯驾(Peter Parker, 1804-1888)(见图 1),受美国教团美部会的派遣来到广东。在当时,由于来华教士患病常常难以得到合适的治疗,伯驾传教之余在医学方面的使命本来是为其他教士服务。但是伯驾以自身的体会,发觉通过医疗或可更好地接近中国百姓,于是在 1835 年,他依靠一些外国人及十三行中国商人的捐资,在广州开设了 1 间“眼科医局”,因其位处十三行内的新豆栏街,故又称“新豆栏医局”。

“眼科医局”开张之际,按伯驾记载,“第一天没有人前来”*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1932: 178.*。不过,“至翌日则有一患眼疾妇人就诊,第三日则有六人,其后逐渐递增,至数月后,则每日开诊之时,来诊者户限为穿”朱庆澜,梁鼎芬,邹鲁. *广东通志稿: 第 3 册[M]. 北京: 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1: 1099.*。眼科医局 3 个月接诊患者 925 人,头 1 年共达到了 2 000 人。

有鉴于伯驾通过医学接触中国人的成效,一位原来也曾是东印度公司医生的传教士郭雷枢(T R Colledge)在 1835 年撰文提出:

“中国人经常表现出对世俗的或身体上的利益,比对任何旨在提升他们的道德和智慧状况的努力更有兴趣。”因而吁请教会“雇请开业医生作为传教士来华”*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pamphlet, pressed by Chinese Repository, 1838:23-24.*。

1838 年 2 月,郭雷枢、伯驾等联合其他教士在广州成立了“中华医药传教会”,图 2 博济医院是近代历时最长的西医教会医院明确地提出“以医传教”的思想,提出要鼓励、帮助更多传教士医生来华,这样

“他们的病人将不仅听说,而且还会亲身体会到,从西方来的人士是好人”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pamphlet, pressed by Chinese Repository, 1838:11-21., 有利于吸引群众,方便传教。

作为“以医传教”的成果,广东在中国的西医发展史上取得了许多个第一:

第一间西医诊所——如果包括从明朝起被葡萄牙占据的澳门,则这里一直有零星的为外国人服务的西医,还包括基督教传教士来华早期也曾在澳门设立诊所。而公认为近代西医正式进入中国内地的标志,则是伯驾的“眼科医局”。它后来由另一个美国传教士医师嘉约翰(John Glasgow, 1824-1901)主持,改名为“博济医院”(见图2),是在华历史最久的教会医院。

图3 近代最早的中文西医著作《全体新论》

第一间西医学校——1866年嘉约翰在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学校(又称博济医学校)。1904年该学校改称华南医学院,即中山医科大学前身。1886年孙中山曾在此就读。

第一本中文西医著作——《全体新论》(见图3),这是英国医学传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 1816-1873)在广东南海人陈修堂的协助翻译下,于1851年出版的。书中对西方解剖学的详尽介绍,令中国知识分子耳目一新,大受震撼。

第一种西医刊物——1868年嘉约翰编印《广州新报》,宣传医疗卫生知识,后停刊。1880年复刊,改名为《西医新报》。这是中国最早的中文西医杂志。

第一个西医留学生——黄宽(1829-1878),字绰卿,广东香山县东岸乡人。1847年赴美留学,在麻省曼松学校得文学学士学位,1850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医科,获医学学位。1858年到广州,先后在惠爱医院、博济医局行医。据记载:“五十年来,凡欧米人之居留广州者,有疾无不归先生(指黄宽)治疗;所有兵舰,亦概以先生为医官。先

生在,虽有欧米医,莫之任也。”陈垣.黄绰卿像题词[J].医学卫生报,1908(5):2.可见其医术之高明。

.....

走进国人生活的西医

应该说,“以医传教”的策略效果是相当显著的。1840年《澳门新闻纸》载传教士描述,广东人“平常尽皆恨恶我等”,但“在我等多样事业之中,只有医学乃系中国之人颇肯信之”转引自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二)[M].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491.。

以伯驾为例,他的病人遍及广东社会各个阶层。他采用的一些手术治疗方法,对中国人来说是应该是颇为奇特的,然而经常接触外来事物的广东人并不惧怕。据伯驾记载:“很少有病人表现出不信任。一位65岁的回族妇女,双眼患有白内障。当我问她是否能忍受手术时,她回答说:‘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它们取出,再把它们放进去。’”Peter Parker. Ophthalmic Hospital at Canton[J].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36, Vol IV(10): 472. 时人还有诗称颂他的医术说:“治法迥与中国异,三分药石七分针。求医之人满庭宇,肩摩膝促犹鱼鳞。”爱汉者.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7:404.

伯驾的病人中还包括了先后任两广总督的耆英、徐广缙等高官,甚至还有抗英名臣林则徐。据说林则徐由于患有疝气,曾托人向伯驾咨询,伯驾详细地为其解释此病的机理,还画了解剖图以说明,不过林则徐并未接见伯驾,只是派人取走了伯驾为其制作的疝气托。一些清代笔记记载,1850年林则徐临终时三呼“星斗南”而歿,人多不解其意。张之洞到广东后,始悟其所说为“新豆栏”,“新豆栏,广东要地。公临歿连呼之,人讹为‘星斗南’”王德乾等.南皮县志[M]铅印本,1932:卷14“故实志下”之43-44.,在闽南话中这两者同音。有

人由此猜测,他是不是在后悔未找“新豆栏医局”的伯驾看病?有关此事说法纷纭。一种说法称林则徐实际是被洋商暗害,因此临终时恨呼洋商所在地“新豆栏”;另有人认为他说的其实是神州话“心头疼”,均见来新夏《林则徐死因之谜》一文,见来新夏. 依然集[M].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201-204. 独朱维铮先生认为林则徐之所以三呼“新豆栏”,是“念及十一年前曾经解除他宿疾的新豆栏医局”,见朱维铮. 走出中世纪二集[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214.

伯驾的一个助手莫菲·黛摩还记载,在他为一位官员的女儿阿思小姐成功地治疗了白内障后,惊讶地看到在这个“社会的苛刻戒律严禁女人和丈夫以外的任何男人接触”老尼克. 开放的中华——一个番鬼在大清国[M].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40. 的国度,阿思小姐竟然亲自前来医局向他道谢,并亲笔题诗在扇面上送给他。

据统计,至1919年,仅基督教新教各差会在广东开办的医院就有39所,病床达2722张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 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359. 西药店也陆续开张,如英国人办的屈臣氏药房于1850年在广州设立分店,日商森清太郎1870年在广州打铜街开设岳阳堂药房等。

于是,在这个时代,中国社会正式出现了中、西两种医学并存的局面。对于老百姓来说,新事物一开始只是带来了新奇体验,和增加了就医的选择和便利。但在潜移默化之中,社会对传统医学的认知发生了改变。传统医学与传统文化的其他领域一样,步入了著名中西汇通医家唐宗海所称的“古今大变局”唐宗海(1851-1897),四川彭县人。他著有《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在近代流行甚广,使得“中西医汇通”的提法深入人心。唐宗海认为汇通中西乃是医家应对“大变局”的责任,曾说:“余以菲材,值此古今大变局时,自顾一手一足,毫不能扶持中外,惟于医道尝三致意,因摘灵素诸经,录其要义,兼中西之说解之。”见唐宗海. 中西汇通医经精义·自序. 上海:千顷堂书局,

1908：1. 中。在这个“变局”里，人们要面对的不仅是医学知识与思维的差异，更有社会整体环境改变下的适应与生存问题。

最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在医学领域的“变局”中，传统医学并没有像大多数旧式学术一样，被从制度上连根拔起，仅剩下精神上的文化存在，或变成新式学科中的研究材料。它最终保持了基本完整的理论体系，只是在形式和内容上为适应时代有所变化。这样的结局何以达至？百年来中医有怎么样的“变”与“不变”？在近代始可称得上“崛起”的广东中医，发展至今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重镇，它在百年沉浮中获得了什么样的力量？以广东一隅折射中国全豹，或可引起对传统文化、传统医学与现代化的关系的更多思考。

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医学，在晚清突然遇到一种完全不同的外来医学，会有怎样的反应呢？事实看来，冲突堪称剧烈。然而仔细想想，其间有多少是真正的医学讨论，又有多少是裹挟于时代大潮下的浮器之争？旧中国之落后，首先是制度的落后。这或许是论争伊始人们得出的最有价值的结论。

晚清中西医的汇通与论争

中国传统医学已经发展了数千年，现在遇到一种完全不同的外来医学，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很多人都知道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有关中西医的剧烈冲突。然而在一开始的时候，情形并不是这样的。

汇通中西医学的尝试

中国医学发展到 19 世纪，固然有着辉煌的成就，然而有心人亦始终感觉到某些缺憾。一位河北玉田籍的医家王清任就觉得，中医对人体内脏的认识一贯以古典医书为依据，从来不作实际观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冒天下之大不韪，亲自观察残尸并造访刽子手，罕有地写出了一本中医的解剖著作《医林改错》，对医界产生不小的震动。

《医林改错》正式出版于 1830 年。但 1829 年,一位中医生陈定泰在广州就有幸从一位友人处听闻了王清任的事迹和他的发现。陈定泰是广东新会人,自少学医,但自觉临证不验者多,正处于学术上的苦苦求索期。这一年他因为母病而访医羊城,听到王清任有关脏腑之论后,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图 4 最早汇通中医与近代西医的著作《医谈传真》但所知不详,又觉得对于困扰他的经络问题,王清任似乎也未提供答案。这时另一位友人胡琴川对他说,西医有解剖尸体的做法,“欲考经络之真,非西洋之医不能”,并介绍了一位曾目睹解剖的中国人梁嶙山。陈定泰多次去拜访梁嶙山,梁嶙山便带他直接去见西医医生。西医医生向他出示了解剖图本,厚约二寸,数百幅图详细绘制着皮肉、筋骨、脏腑等结构,十分精细。陈定泰详细察看了十数遍,顿觉对人体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与古传医书相较,“孰真孰假,判然离矣”。他反复研究王清任观点和西洋解剖图的结果,收录在 1844 年写成的《医谈传真》中。

前面提到,西医书籍之中译本要到 1850 年才出现。陈定泰在当时所见到的,只能是西文原版医书。他拜访的西医医生是谁没有具体记载,在时间上看不无可能与伯驾有关。在对方的解释下,陈定泰对西医中最重要的解剖学知识有了基本的了解。自 16 世纪意大利解剖学家维萨留开始发展起来的近代西医解剖学,到 19 世纪已经相当成熟,对人体结构的认识深入且有系统,运用西方绘图法绘成的解剖图也精细逼真。陈定泰当即认可这就是“真脏腑”,可以纠正许多古代医书的错误。因此他在《医谈传真》一书中,首次收录了 16 幅西医解剖图,并且突出地置于卷首,书中还结合解剖知识对中医传统的脏腑理论一一进行对照讨论。陈定泰这种对西医开放的接纳态度,还为他的家族成员所继承。40 多年后,继承了家传中医学学术的陈定泰之孙陈珍阁甚至亲赴南洋新加坡,在当地的皇家大医院正式学习西医 3 年。陈珍阁回国后也写了一本《医纲总枢》,更加系统地介绍了西医的生理、病理与临床知识,并与中医的治疗结合。

西医解剖知识,对习惯于中医传统粗略而写意的人体观念及图形的中国人来说,是极具震撼力的。陈定泰引用的解剖图都标上了中文部位名称,这可能是最早由中国人进行的解剖名词翻译。可惜他的著作只是在小范围内流传。到了1850年,英国传教士医生合信在中国助手协助下正式出版了系统介绍解剖知识的中文著作《全体新论》,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出版后“远近翕然称之,购者不惮重价”,两广总督叶名琛专门为之作序,十三行商人潘仕成将其收入海山仙馆丛书重新印行。

解剖学改变的是人们有关身体的观念,这成为医学观念改变的先导。正如合信在书中所说:“予来粤有年,施医之暇,时习华文,每见中土医书所载骨肉脏腑经络,多不知其体用,辄为掩卷叹惜。其医学一道,工夫甚巨,关系非轻,不知部位者,即不知病源;不知病源者,即不明治法。”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许多广东中医,包括有知医传统的知识分子,对这些知识都像陈定泰一样抱着求知和探索的欲望,并没有贬斥的心态。当时的官员甚至将这些知识纳入地方考试的范围。1887年广东学政汪鸣銮在考试中首次设立“医学经古”科,以医学课士,录取两人,一为朱沛文,一为孔沛然,均为通习中西医的儒士。其中朱沛文出身中医世家,曾“兼读华洋医书,并往洋医院亲验真形脏腑”,多次将自己有关中西医学比较的文章进呈学政,获得赞许,他后来著有《华洋脏象约纂》,是一本客观探求中西医人体观念差异的专书。而孔沛然除精通中医外,还进过博济医院开办的学校学习西医,后来担任了两广军医学堂的军医长。

这些比较中西医异同、希望融汇两者之长的思想和行动,被人们称作“中西医汇通”。当时以朱沛文等人为代表的汇通医家形成一种观点,即西医解剖对人体结构的认识虽然深入,但并未能反映人体生命活动的全部;中医在人体知识方面不够准确和细致,但有“气化”观念之长处,为西医所不及。什么是“气化”?要三言两语说清楚并不容易,简单地说,中医认为人体一切功能活动的主宰是“气”,“气

化”则是“气”支配下人体功能活动的表现。中医主要是通过观察人体外在的活动表现来推理其内部机制。这些推理出来的结论,有的无法在西医解剖知识中得到印证。但朱沛文等人认为这不等于中医理论错误,只要临床上能印证就可以了。例如像人体的经络和穴位,在解剖中找不到,但中医临床应用有确凿效验。对此朱沛文解释说,经络是“气”的通道,由于西医解剖知识来自尸体,而人死后“气”已散,所以不可能找得到。“气化”无形,但主宰有形的躯体,对“气化”,相比于西医所具有的优势,1908年出版的一本中医刊物这样写道:“中国上古列圣相传,未始不由验视脏腑而得治病之法者,惟古圣人知人身中必有无形以驭有形,而后能知觉运动,是非剖割所能探取,器具所能测量也,于是通阴阳之变,参造化之机,而医学由是兴焉。西洋医学仅凭迹象,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如髓病而不知髓所从生,筋病而不知筋于何属。一遇上热下寒、下热上寒之症,寒暑表即穷其用,故头痛救头,所谓治病必求其本者,毫不参考。以是知主形质之精浅,不若主气化之精深也。”

医学是一门很实际的技艺。一个医生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时,首先关注的是实际效果。朱沛文等以临床为标准来客观评价中西医学,并深入思考其差异的原因,是很有见地的做法。当然,有关中西医具体理论或临床疗效的比较,依然是一个相当复杂并且极富争议的话题,这里不作过多的讨论。在本文中,主要关注的是他们对待中西医学的看法与态度。可以看到,在西医传入之初,很多中医秉承了历史上一向勇于吸收外来医学知识的传统,对研究和吸纳西医知识的态度是积极的。

中西医论争骤起

然而,近代的西学东渐,是在强势的西方政治军事背景下进行的,因此无法单纯就学术而论学术。医学上的交流也一样。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之际,中国经历了1894年甲午之败和1898年戊戌维新的天

折,1900年又蒙受八国联军侵华之耻,亡国灭种的危机空前强烈,整个民族改良图强的呼声高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之下,中医与西医,在共有的主词“医”字之外,其修饰词“中”与“西”的对立就变得益发明显起来。

这个时期的中西医言论,开始趋向于两个极端。

一种倾向是,为图强计,主张全面接受西医,对中医大加抨击。无锡丁福保说:“吾国医学四千年来谬种流传以迄今日,不能生人而适以杀人……西人东渐,余波振撼,侵及医林,此又神农以后四千年以来未有之奇变也……呜呼!西方鸿宝,来贡神州,我国民应何欢迎而拜受之也!奈何一孔之医,斥为未达,墨守旧法,甘为井蛙,坐视病夫盈国,死亡接踵。伤心惨目,有如是耶?”这番言论的背景,是以日本废止汉医为参照的。日本这个昔日藩属,一朝维新便打败天朝上国,使得甲午之后中国形成一股取法东瀛的热潮。丁福保曾于1909年受清廷委派,任考察日本医学专员。而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全盘西化,取缔汉医(日本对中医的称呼)的做法,自然也对中国欲效法者产生影响。

而相反的一种倾向是,大力宣扬中医的优势,作为中国维持民族尊严的工具。一位自号“罗浮山人”的广东医家,著有《历脏篇》一书,虽然承认“脏腑真形,今欧西医家者流,为得之亲见,仆尝见其图,叹为精绝”,但坚持认为西医“验诸既死遗骸,恐有违失”,亦即不明气化之理。因而他主张以道教的“内视”(据说高明的内丹修炼者能内观体内脏腑和经络的状态)来寻找脏腑的真谛。书前其友人在1896年作序时大为赞赏他的思想,并认为是振兴国技、抵御外侮的典范,说:“夫今中国至敝至弱,百家执技以生者,夺于异类且尽,医亦然……夫今天下大江南北,奇材异能、杰出众中之士亦伙矣,亦念西夷之小我、易我、夺我如医者,且遍至于无穷,而思所以竭忠尽智殫能以雄胜之,以制其生死之命。”完成于1902年的《医学刍言》,提出的宏愿则是:“吾愿阐岐黄之坠绪,绵绵震旦之宗传,庶我国七十万方里,四百兆人民,痍疾不足患,种族以于强,卫生而繁育,永甲乎环球!”

另一种言论则从利益的角度来讨论对中西医的取舍。清末《医学报》举行了一次“肆诋中医之腐败滥觞不在东西医而在甘为东西医奴隶之医说”的征文,获征文第一名的文章除了痛斥诋毁中医者“数典忘祖”外,更反问:“东西医未必占优美也。即全占优美矣,蔑以加矣,而利权外溢,国粹云亡,塞漏卮之谓何?光旧物之谓何?”意为假如完全取法西医(文中“东医”是指日本西医),则中国的医药行业利益将会尽归外人。

倡言西医者举着保种强国的大旗,维护中医者则以维护民族利益与文化传统为己任。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关于中西医的对比与论争,有着过多的非学术因素,言辞亦不复平和。就像晚清小说家“我佛山人”吴趼人在一篇涉及中西医的作品中说的,“西医非不可备一格”,然而“有狂悖之徒,就医学于彼族,犹未毕业,即狂呖而言曰:‘中医将绝于世界。’”实在令人生厌,故“吾特恶夫挟西医以诬中医者”。学术问题变成社会议题之时,论争的焦点已渐渐偏离了本旨。

改良医政的呼声

面对西方医学,上述汇通医家、提倡西医者、维护中医者,以及更广泛的社会人士,却有着一个共识,那就是中国的医学体制确实落后于西方,需要改良。请注意,这里说的是“医学体制”,而不是说中医。作为知识与实践体系,中医与西医比较优劣如何,中西医能否融汇等,问题见仁见智,未有定论。但在近代西方,“医学”的概念已经大大扩展了,并不限于医学知识本身,更为重要的是其建制化的发展,亦即介入到公共卫生、人口统计、死亡分析等诸多领域,教育和执业也制度化、规范化,成为国家政治和社会事务的一部分。相比之下,中国尚无此类制度,学者们所能考察到的中国古代“医政”,大部分都是皇家宫廷医疗机构的历史,殊非近代医疗行政的概念。

传教士医生进入中国时,早就直指这个问题。合信曾说:“西国医士,必须屡经考试,取列有名,方准行世。其贵如中国举人、进士之

名,其法略如中国考取文士之例子,所以习之者精益求精。中国医士人自为之,不经官考,不加显荣,此不精之故也。”中国医家也都认同这一观点。一位曾奔走省港南洋救治疫症的南海医家梁龙章说:“西国论华医,谓中国公家无试医科大吏,无提倡、无毕业出身明文。既乏专门教育,医学固无根底。”中国是“举国皆医”,“无论九流三教,科甲举贡生员,读书不第,涉猎医书,皆称儒医”,难怪西人“谓中国医学废弛,流品最杂,无专门医学。”这个问题的意义超出于医学范围,为改良知识分子所重视。梁启超在维新时期,根据外国经验,提出“保民必自医学始”,指出“西人医学,设为特科,选中学生之高材者学焉。中国医生乃强半学帖括不成者为之,其技之孰良,无待问矣。”又批评“今中土既不以医齿于士类,士之稍自重稍有智慧者,皆莫肯就此业;医师之官不设,无十全为上之奖,无十失四五之罚,坐听天下之无赖持此为倚市糊口之术,杀人如麻”,把兴医学视为维新新政急务之一。在近代影响极大的政论著作《盛世危言》中,图5著名改良主义活动者郑观应也是汇通中西医学的积极倡导者

作者香山人郑观应也有专篇谈这个问题,指出西方医师有严格的考核制度,“其难其贵如中国之科第然”,呼吁中国效法西方建立医疗管理制度,并曾为之赋诗说:“急宜开学校,精益求精,卒业给执照,注册纪姓名。”郑观应.罗浮待鹤山人诗草·书中国医士讼师与泰西不同;“亟设医学堂,考验严功令,良医给文凭,庸医示惩戒。”黄炽华的《医学刍言》列举政府应实行对医药“严考成”、“立治案”、“聘通材”、“禁伪药”等“监督之政令”四端,建议哪怕先从广州做起,“发起于省会,推而及诸各府州县,粤民幸福何快如之!”

从晚清开始,中西医为社会制造了许多议题。事实上仔细想想,有多少是真正的医学讨论,又有多少是裹挟于时代大潮下的浮嚣之争?中国之落后,首先是制度的落后。这或许是论争伊始人们得出的最有价值的结论。

光绪甲午, 公元 1894 年, 在广州发生了有 10 万人死亡的大瘟疫。没有专业医疗队伍和公共卫生政策的广州, 就如同一座对瘟疫不设防的城市, 仅靠个别医生英雄和道德志士, 无法阻止它的沦陷。这场大疫, 以惨酷的形式, 再次向晚清政府提出了医事管理与公共卫生改良的问题。光绪甲午, 公元 1894 年, 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多事之秋。这 1 年, 慈禧 60 大寿, 早在 1893 年光绪帝就发上谕说: “甲午年, 欣逢花甲昌期, 寿宇宏开, 朕当率天下臣民胪欢祝嘏。” 颐和园加紧装点, 各地忙于筹办礼品。然而最响的礼炮来自东瀛——1894 年下半年中日在朝鲜开战, 继清朝陆军一败涂地之后, 北洋水师又于黄海覆灭……一项考证称, 这场战争中清军伤亡约 35 000 人。

或许是军国大事太重要了。这 1 年, 在广州发生了有 10 万人死亡的大瘟疫, 却很少在官方记录里被提及。

图 6 1894 年, 恐慌的广州市民从南海神庙抬出铜鼓游行, 祈求神灵驱除疫病

1894 年广州疫况

1894 年, 广州天时不正, 自春天起就陆续有瘟疫病人出现。1 位中医医生回忆说: “今春瘟疫渐行, ……3 月疫气流行, 触目皆是。” 而西医生内勒司(Niles)也在 1 月 16 日诊视了 1 个病人, 患者高热, 腹股沟部疼痛肿胀。从症状来看, 正是后来确定的此次瘟疫元凶——鼠疫。

历史学家根据文献记载, 推论在明末时期中国已经有鼠疫大流行, 当时称之为“疙瘩瘟”等。后来由于发现主要经由老鼠携带传播, 于是将其命名为“鼠疫”。中国最早关于此病的医学专著是《治鼠疫法》, 由广东吴川人吴存甫著于 1891 年。

1894 年广州的疫情, 显现于 2 月至 3 月, 暴虐于 4 月至 6 月。对广州市面的情况, 《申报》有如下报道: “粤东保甲总局会办委员候补道陈厚斋观察籍隶皖江, 宦游粤海, 正当强壮之年。3 月 27 日赴局办公, 毫无疾病, 回寓时沾染时疫, 28 日早起精神稍觉疲困, 即飭人赴宪

辍请假 3 天, 藉资调养, 不料陡然变症, 神志昏迷, 多方救治, 药石无灵, 延至是日晚 4 鼓时, 溘然长逝。” (《申报》1894 年 5 月 16 日)

“某姓, 家男妇 8 口, 1 日之内死至 7 人, 只存一女孩, 不能出备棺衾, 致尸骸纵横, 屋内突一偷儿乘机掩入, 向女孩索取银钱, 女孩令代筹 7 人身后事, 许以事后将室中所有悉数畀之, 贼允之, 既由市返, 则女孩亦已倒毙室中, 贼乃放胆搜刮所有, 不料未及出门, 即染疫毙命。” (《申报》1894 年 5 月 17 日)

“省中文武大小衙门无不传染, 运署最甚, 南海县次之。刻下书差人役竟有迁避一空者。” (《申报》1894 年 5 月 23 日)

“新填地聚开妓, 有解语花五枝……1 日早起, 5 人皆染时疫, 势极沉重, 延医诊治。惟 2 人应手而愈。3 人则玉陨香消, 返魂无术矣。……一时隶名娼籍者深恐传染, 遂迁避一空。从此燕垒泥封, 蛎墙花落, 杜郎重到, 当悔寻春之晚矣。” (《申报》1894 年 5 月 27 日)

“城厢地方瘟疫大作, 两月之久仍未止息, 且传染之速, 尤觉日甚 1 日。常有宴饮之际, 席未终而身已亡, 谈笑之余, 音尚存而魂已散。疫症出于俄顷, 药石无所用之。” (《申报》1894 年 7 月 9 日)

当时参与第一线救治的广州中医易巨荪形容全城之惨状说: “甲午岁, 吾粤疫症流行, 始于老城, 依次传染, 渐至西关, 复至海边而止。起于 2 月, 终至 6 月, 凡疫疾初到, 先死鼠, 后及人, 有一家而死数人者, 有全家覆绝者, 死人 10 万有奇。父不能顾子, 兄不能顾弟, 夫不能顾妻, 哭泣之声, 遍于闾里。” 所称十万死亡人数为粤海关 1895 年报告采用。与之相印证的是一位传教士 Wales 的统计, 在阴历 3~6 月间, 广州城中售出 9 万具棺木。其中虽然不一定是全部死于鼠疫, 但实际疫死者中肯定也有很多贫民无力购棺。

中医救疫显成效

在惨剧面前, 首先被人们寄予希望的自然是医生。